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九四期 ——
(二〇一一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4a)

【书刊评论】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二) 丁凯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二)

• 丁凯文 •

十、林彪与江青的斗争

以往官方的史书众口一词，将林彪与江青的关系说成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吴法宪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已作了很好批驳，而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更详实的史实和更完整的内容。

据邱会作的亲身观察，林彪对江青的斗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上：

(1) 分化中央文革小组。这主要是把陈伯达这个文革小组组长争取过来。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很快发现了，江青一伙反对军队的事，陈伯达开始不积极，后来不参加，再以后就通消息了。1967年初林彪搞《军委八条命令》，正是造反势力最猖獗的时刻，陈伯达顶住江青的阻挠，把它促成了，取得了林彪的信任。陈伯达深知中央文革的一段事在历史上不好交待，要辞职。林彪不同意，说：你不占住这个位置，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人会更多。有了陈伯达，中央文革里的事林彪清楚，江青的行为受到一定的制约。”（《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

出版社，2011年版，页163，以下仅注页码）陈伯达虽然不是文革小组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一切都要听从的江青的发号施令。但是陈伯达依然具有文革小组组长的名分，对造反派们还是有相当的制约作用。

（2）林彪限制军队内部的人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打交道，避免江青插手军队事务。邱会作说：“林彪不愿直接和江青来往，若是江青有事找军队，便叫杨成武、吴法宪去打交道。”林彪对康生则不假辞色。邱回忆说：“康生几次向林彪示好都遭到婉拒。好像在1968年初夏的时候，《参考消息》原文转载外电一则，称林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向林彪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我主管中联部，这个差错我应当负领导责任，林总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副统帅，决不是总书记可以比的。今后请林总多批评，也可随时当面赐教。林彪思考良久，叫秘书打电话告诉康生三个字‘已收到’，就算完事，把他拒之门外。”（页164—165）林彪压制上海帮，几次训斥上门来访的江青。邱回忆说：“江青想取悦于林彪，染指军队，常往林彪家跑，但是林彪不欢迎她。1966年10月军委紧急指示以后，林彪厌恶江青，关系很不好了，1967年‘一月风暴’后更是差到了极点，有几次江青向林彪提出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赖着不走，林彪当面‘训斥’叶群，命令‘把客人给送走’。有两次林彪被江青纠缠得发火了，指着她的鼻子骂。除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敢那样对待江青。”（页164）

（3）林彪明确指示军委办事组要像“防贼”一样防备江青向军队插手。邱回忆说：“军委办事组改组不久，林彪对我们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林彪还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绝对不能让他们（江青）进来搞乱。”（页183）由此可见，林彪对江青等人的认识一直是很清醒的，对江青的抵制也是极为明确的。

（4）林彪对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曾向周恩来发难，在一次讨论刘少奇的案子时，江青声称“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祸首揪出来了，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罪魁也不能放过。”周恩来对此十分紧张，担心江青的意思来自毛泽东。当邱会作向林彪汇报后，林彪说：“第一、总理是主席信任的人，江青在说疯话。第二、王明路线‘七大’已有定论，没有主席的许可，谁也不许翻老账，我会向主席去谈。第三、你们要全力支持总理工作，要防止发生第二次‘陶铸事件’。”（页186）有了林彪的支持，周恩来对付江青更有信心。

对于这一时期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总结说：“十二中全会前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一度紧张。江青曾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或是以什么名义让她正式上台，但是林彪反对。……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前，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知道的人很少，仅是碰头会上的几个人。杨成武、吴法宪对我以隐瞒为主，但我能判断得出来，否则我就没法配合他们工作了。黄永胜主事后，就向我和李作鹏公开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给江青以显赫的地位。林彪迷惑不解，他在揣摩的同时以支持为主，捧过江青的场。1966年10月，江青挑动军内机关院校造反‘四大’，林彪就讨厌她了，由汪东兴帮助，林彪摸了些‘底’。毛主席对江青‘论公’有利用，但并无长远培养的打算，‘论私’更没有什么了，甚至有‘包袱感’。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林彪是提防江青，全会后，就抵制她了。”（页200）

林彪对江青的抵制是一贯的。林彪对江青采取“三不准”办法：不准文革极左派的人钻进军队，不准军队里有江青的代理人，不准江青插手军队的工作。虽然这“三不准”未有形成文字，但是在军委领导核心工作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江青曾提议文革小组的关锋出任总政副主任，一度命令都写好了，但林彪最终还是拖了下去，直至作废。（页402）萧华、杨成武都曾是林彪的嫡系爱将，由于萧、杨与江青过度的密切关系，林彪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徐向前地位虽高，但林彪就是不恢复全军文革小组，不许徐在其中再起作用。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一度

与江青打的火热，江青为了挖林彪墙角，刻意拉拢温玉成，不仅让温参与中央碰头会，温玉成还想通过江青进入政治局，更上一层楼。然而这样一来，温在军委办事组内也难于生存了。林彪不仅不同意温在九大上进政治局，甚至后来干脆将他放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

十一、中共“九大”的几个问题

中共“九大”是文革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邱会作的回忆有几点值得关注：

（1）林彪何以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新的党章草案由康生、张春桥负责，增加了“接班人”这一新条文。但是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正式提出删除新党章中的“接班人”字句，但江青和张春桥却发言竭力为此辩护，得到与会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林后来再次表示不同意，但毛泽东出面表态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毛泽东表态如斯，林彪也就不好再开口反对了。然而，上海帮为何要如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对手林彪呢？据周恩来事后对邱会作所言，原来张春桥等人想在新党章中将林彪列为“接班人”的同时，也借机把江青列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但是此举受到康生的反对，康生认为如果不谨慎，已经得到的东西也会丢失，不仅军队方面反对，连毛泽东那一关也通不过，毛泽东怎么会同意把江青写进党章。但是由于党章初稿已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如果拿下来又会成为新的政治问题，故只好保留，由毛泽东裁决。结果是中央文革弄巧成拙，白白送给自己的对手一顶桂冠。由于康生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说服江青尚需周的配合，故周恩来也洞悉了其中之内情。（页212—214）官方对此的说法是：这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的结果。但历史恰恰相反，是林彪与江青斗争的结果。江青等人原打算“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希望林彪能够对此投桃报李，支持江青出任政治局常委。未料林彪对江青厌恶至深，怎么可能让江青等人的计谋得逞。

（2）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在1969年春节后吩咐陈伯达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并请陈与林彪商量。陈有意撇开张春桥等人，与林谈妥后定下大意和纲要。林彪和陈伯达虽然没有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话挑明，但意思都说了。他们特别为政治报告起了个题目：《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的草稿遭到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江青甚至指着陈的鼻子大骂，声称陈伯达报告稿上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搞经济建设是公开把赫鲁晓夫的观点写进我们的报告里来了。与此同时，张春桥等人也起草自己的政治报告，并请毛泽东及时修改。陈伯达就此曾在军委办事组发牢骚，邱会作回忆说：“陈伯达说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只提文化革命运动，不提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正常工作，是和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运动就是一切’如出一辙的修正主义东西。”林彪得知陈起草的报告被否定后，对此就不理不问了，甚至连看都不看。（页206—210）笔者认为，这正是林陈与毛泽东政治思想分歧的开始。林彪和陈伯达希望将中共的理论基调拉重新回到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上来，即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而江青、张春桥等人却真正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衣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中共的核心任务。在在显示了林陈与毛江的根本分歧。

（3）毛泽东在九大上带头捧林彪。在九大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好不好？”林彪马上反对说“好不好，大会主席团主席要毛主席当，赞成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的请举手！”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邱会作指出“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有‘文章’。他这样作和他的开场白，是为大会定调子。”（页222）此后，周恩来在九大的发言中，长篇颂扬林彪。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忱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了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为何周恩来对林彪作如此颂扬？邱会作说“周恩来没有自己的目的，他是跟随毛主席呀。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说要林彪当主席团主席，那么捧林彪，这就要大家也要有个态度了。你可以看各代表团里的发言嘛，捧林彪比周恩来过分的人多了，老同志捧，新人也捧，革命派捧，造反派也捧，是一股风嘛！这个风，是毛泽东自己掀起来的！”（页231—232）林彪在九大上被树为党章上的接班人也是由此而来。

（4）“中央文革”的命运。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是否还应继续存在成为中央高层的一个角力。江青等人极力主张维持这一机构，但党内老干部们却一致反对，原因就在于“中央文革”集党内整人之大成，整人太多、太狠、太残忍。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对此意见是一致的，即九大后“中央文革”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颇有自知之明，毛对周恩来说“‘九大’后不能再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处理中央的工作了，中央文革这个名字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太臭！不能再用了！今后怎么办，今后再说。”周则向林彪和陈伯达通了气，唯独江青不明底细，几次上门找林彪，提出“文化革命正在紧张进行，什么时候结束还遥遥无期，中央文革还要继续存在。”林彪总是不表态，或予以敷衍。（页219）中共九大并未对“中央文革”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行使的职权予以追认。九大后新的政治局开始工作，“中央文革”最后竟然无疾而终。

毛泽东为何同意取消“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要利用“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倒台后，经过“三支两军”和各地区“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局势走向平稳。故此，“中央文革”的阶段性使命已然完成，再加上“中央文革”在党内不得人心，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让“中央文革”走进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打算停止文革运动从此放弃江青，或让江青等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毛要他们新的政治环境中换上另一个面孔发挥新的作用。

另有一个插曲是九大主席台座位的排列，毛居中，左边是林、再加上康、江等中央文革成员，右边是周为首的“旧政府”成员。现代党史教材大都认为如此排列“对照鲜明，意味深长”（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89页）。不少海外文人也对此津津乐道，自以为真的“发现了新大陆”，得出中共高层政治确实“左右分明”的结论。但据邱会作的回忆，这实在是出自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是为了应付江青的结果。如果按以往的政治地位或职务高低来安排主席台上的位置，江青必然会被排到边上去，那样一来江青就会大吵大闹，因为江青已是中央文革的“霸王”，绝不会坐到边上去。于是周恩来动了脑子，尽可能让江青坐在靠中间一些。这么安排实在是周恩来被逼出来的。（页224）如今的党史教材以所谓中央排座位以期“左右”共治，实乃望“人”生意，胡想臆测而已。

（5）江青在九大上的表演。（A）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地区的“劝进书”，要求江青当政治局常委，甚至提出江青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发了脾气，大会及时收回这些劝进书。（B）江青在分组会上肆意攻击陈伯达，吹嘘自己的文革功劳。（C）上海帮摧残陈毅，在华东组王洪文等人以学习为名对陈毅搞通宵达旦的批斗，最后邱会作通知周恩来解救了陈毅。（D）江青亲自上阵打击“小人物”陈代富。陈代富是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因为揭发四川造反派头头张西挺历史问题，江青亲自到西南组训斥陈代富。没想到陈代富敢于坚持己见，毫不畏惧江青等人的权

势。由于毛泽东发了话和军委办事组的保护，陈代富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后来还被提升为团级干部。（E）江青曾主动召开一次军队代表会议，江在会上诋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声称毛的接班人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姚文元也不失时机地吹捧江青是文革旗手，当然是毛的接班人。邱会作特别吩咐军委机要员将江青谈话记录稿送中央常委传阅，并故意先送康生过目。康生看过后太急，马上扣下记录稿不许再传阅，并要求军委办事组收回其他可能的外流。（F）九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军委办事组几人做了手脚，让江青等人的选票少了一些，引起江青的不满。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要求查票，还声称这是“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由于康生不同意，毛泽东也表态反对，查票一事不了了之。但周恩来事后提醒邱会作，除了原则问题，小的问题不要搞小动作。周还特别告诉邱，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就选票一事也有人打小报告给周，周则息事宁人压了下来。（页 2 4 5 — 2 5 2）

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回忆，深有感慨。首先，江青在中央里的仗势欺人、霸道、无耻跃然纸上，让世人知悉文革极左派们是如何不择手段达到其目的的。其次，当时在中央里只有军委办事组诸人是制衡江青的唯一力量，连周恩来亦不敢对江青不敬。再次，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之间搞平衡，在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否定了江青等人的无理取闹。

十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揭秘

没有邱会作的这份回忆，也许世人永远无法知悉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内情了。邱会作的回忆是根据他日后与黄永胜的交谈，另外还有来自周恩来、汪东兴、叶群等人的信息汇集而成。所以，以下这些回忆极具历史价值。（页 2 5 2 — 2 7 1）

（1）酝酿政治局人选的“三人小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九大”会后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酝酿政治局候选名单。“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按照常理，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拟定应是毛、林、周三决定，而此次变成周、康和党内资历不深的黄永胜。毛泽东指定周、康、黄负责提名人选，毛林则退居幕后。“三人小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康生显然代表了“中央文革”，而黄永胜则是军委办事组的代表。“三人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严格保密，不与外界联系，除毛林电话外，其他电话不得接到“三人小组”。

（2）第一个人选名单依据的是，八届政治局委员未倒台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中央各大部门、军区的人选。计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王效禹共 24 人。毛看到名单基本满意，但划掉了江青，而林彪则划掉了叶群。“三人小组”再次开会时，周、康窥测毛的心意依旧将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第二次开会时依旧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划掉叶群的名字。毛还提出可增加纪登奎和李德生二人。“三人小组”再次开会时实际上只剩下江青和叶群的问题了。康生坚持江青进入政治局，而黄永胜则转达林彪的意见：坚决反对叶群进入政治局。而周恩来则说“从当前的实际政治情况出发，江青和叶群一定要进入中央政治局。我们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示我们诚恳的态度。”周康黄三人到毛处再次提出江青进政治局，毛最后说“从现实情况出发，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毛泽东身上，我应当完全负责。从今以后，永远不要江青和我一起工作了！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一个女人。”显然毛最终点头同意了这个名字。这样，周康黄再到林家说服林彪，此刻事实已成为如果叶群不进政治局，江青也进不了，反而是林彪给毛泽东难堪了。林彪不得不同意这一安排。叶群实际上是作为江青的政治陪衬而进入政治局。

（3）“三人小组”里只有黄未进政治局常委，令人蹊跷。据黄永胜对邱言，毛泽东曾设想

将常委增加到七人，即毛、林、周、陈、康、黄永胜、张春桥。但毛考虑张春桥进常委带来的问题较多，林彪也不喜张，毛心中犹豫。后来还是林揣摸出毛的心思，提出黄、张均不进常委，遂摆平此事。

（4）中央军委机构和名单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致通过，这与以往的惯例有所不同。这时林彪与军委办事组商议的结果。目的是表示军委办事组乃中央全会正式任命通过的，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这个殊荣，也就是说军队要完全摆脱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军队的老师们虽然没有进政治局，但依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内排名还在军委办事组几位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前面。

（5）江青的不满和闹事。江青闹事的原因：选举中少了一些选票、没有被中央“委托”组阁、未当上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明确“中央文革”继续存在。邱会作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当晚，江青最后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对周恩来发难。江青一到就坐在周恩来经常坐的主持人席上，把周挤到一边主持了会议，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召开的，我宣布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搞阴谋，一切事情不告诉我，电话也不打一个。你们别以为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旧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只要交给革命群众就够你们受的，我们来继续较量吧！”而此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均认为应该取消中央碰头会，改变中央工作方式。

（6）中央碰头会被取消。1969年5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中央常委主持工作，中央不再设书记处等其他机构。”中央的工作成为在京政治局委员工作会议。这实际是终止了江青称王称霸的“衙门”。江青想再次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已经没人参加了。

笔者认为，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显示了中国的政局从文革初期的混乱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毛泽东出于对全局的考量终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而林彪、周恩来等人更不希望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央文革成为中央的常设机构。作为文革的“有功之臣”，江青当然要进入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也必须提拔江青这个自己唯一真正信任的“学生加战友”。事实上，自“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内部形成“军、文”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纪登奎这些文革新贵，另一派则是军委办事组，加上陈伯达、汪东兴。周恩来表面上不偏不倚，但实际行动上还是与军队一方站在一起。这种政治形势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

十三、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的主要工作

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的工作常常不太为人所知，一来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披露较少，二来官方的宣传中也尽量予以忽略或贬低，以致有人干脆声称“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云云（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这一方面，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面貌。（见《心灵的对话》上册第五章“中央工作”）

（1）毛泽东做好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九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对中苏冲突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毛泽东对具体的战略部署也有自己的通盘考虑。

（2）军委办事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战备工作作了十分具体的安排：第一，确定战役的方向，即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也就是将原先的东南地区针对美台的作战方向转移到北部针对苏联；第二，加强各种战略物资的准备，达到“三百万军队打一年”的要求；

第三，抓紧军事工程，防止、阻滞苏军机械化不对的闪电攻击；第四，加强北京的防御，确保中央的安全；第五，成立军委战略预备部队，在太行山两侧、京广铁路北段和陇海铁路一线集中了解放军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的力量，既实行边境防御，也采取诱敌深入方针；第六，全军都成立了“防突办公室”，日夜监视苏方的行动。整个军事战略计划的部署和实施，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不仅自己亲自抓，还经常对军委办事组督促和检查，并乘飞机对张北地区的进行低空勘察，看望驻守在张家口的陆军与空军部队。

（3）“战备一号令”问题。1969年8月底，中国军方情报机关得到情报，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目标是北京，重点则是导弹基地和主要工业城市。毛林对此十分重视，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同时决定，毛林疏散到外地，在京的老干部们也由周恩来通知疏散到全国各地。10月16日毛去武汉，17日林去苏州，并在18日晚8时左右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一份指示，随后在当晚该指示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冠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传达到各军兵种。“一号令”在苏联代表团到访北京后不久即解除，但被疏散到外地的老同志却并未及时回京，这主要是周恩来严格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个别有因病回京检查者也要周亲自批准，且事后还要回到原疏散地休息。

（4）恢复解放军的总政治部。1970年春，江青向林彪提出让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在政治局会上正式提出，吴法宪马上电话报告林彪，林为阻止张出任总政主任，立即到毛处提名李德生出任总政主任。毛在九大期间曾经不经意提及此事，这次林彪没有时间再多加考虑，惟如此方能避免江青等人染指军队的工作。李德生的任命被毛迅速批准。关于李德生与文革的关系，本文后面再予以评论。

（5）军委机关精简整编。军委机关的精简主要是因为因应战备需要，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有的人去了“五七干校”待分配，有的人去了国防工业部门或“三支两军”，还有的就复员转业。周恩来对此予以大力支持。这样一来缩减了庞大的军委机关，提高了工作效率，适应了战备之需要。

（6）组建基建工程兵。这是将原来的国家基本建设队伍军队化，既可提高功效，也可调动自如，便于实施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其实，此事在文革前就已着手进行，到了“九大”后军委与国务院组成了“基建工程兵组织规划领导小组”。此后，虽然因“九一三事件”有所停顿，但最终还是成为解放军的一个新兵种，正式列入军队的建制序列。

（7）加强国防工业。1968年下半年周恩来制定了新的国防工业领导方针，把原属国务院国防工办的国防工业交与军队管理，这么作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减少江青等人对国务院工作过多的干预。主要工作有：恢复军工生产；建立了健全的各级国防工业领导机构；制定国防工业发展规划；整顿和调整国防工业的科研机构；提出了加强国防工业企业管理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针。

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里军委办事组在毛林周的指导下作了大量的工作。军委办事组的这段历史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略或遗忘，甚至被歪曲成配合林彪大搞篡党夺权阴谋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而邱会作的回忆无疑为世人开辟了一扇窗口，让人们重新认识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所起的真实作用。

十四、山雨欲来风满楼——军委办事组与文革极左派矛盾的激化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程光先生《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见《百年林彪》2007年明镜出版社出版）曾予以充分的论述。邱会作的回忆则更加详实、完整地描述了军委办

事组是如何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斗争的情况。（见上册第五章《中央工作》一章中“矛盾激化”一节，页394—433）具体如下：

（1）“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机要秘书，李本人则是温玉成推荐给黄永胜的。李必达工于心计，将军委办事组诸人内部如何抵制江青的活动偷偷地记录下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李在九届一中全会前发现中央碰头会参与人除了温玉成外都将进入政治局，李于是将此事透露给温，并将军委办事组诸人“反江青”的言论写成揭发材料，经过温玉成的帮助交到江青手中，江青则送交毛泽东。但毛对此并未多加理睬。李必达想通过告密方式卖身投靠江青，但却没有得逞。

（2）江青在“九大”后成了“政治闲人”，于是多次找毛林周伸手要官，但总得不到结果，因此常常发无名火。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断绝了与江青的夫妻生活，也不许江青住在中南海。这些具体而详细的情况都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通报给军委办事组诸人的。军委办事组才知道毛为了整垮刘邓，利用了江青冲锋陷阵，但事后并无政治上的特殊使用，反而还对江有累赘和讨厌的情绪，感觉是个包袱。由于有了汪东兴交代的毛江关系之“底”，为军委办事组后来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张春桥树立了信心。

（3）“九大”后，江青几次攻击陈伯达和周恩来。江青对陈伯达的辱骂攻击几乎是不分时间、场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如此这般不可胜数。而陈伯达大都避而远之。江青得寸进尺，甚至攻击陈伯达历史上不干净，并指责陈伯达负责的专案敷衍了事等等。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更是从历史到现实，无所不用其极。1970年5月17日江青自己召集的政治局委员会上，江把周说成是“思想上消极、保守”，“阶级立场和观念有问题”，且“见风使舵，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于江青攻击周恩来，林彪立即要黄永胜和吴法宪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周事后激动地拉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而毛对此事的态度只是对江青稍加批评，并叮嘱黄吴不要对外讲，否则江青知道后。黄吴等人今后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4）温玉成立场的转变。1968年初，温玉成从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有如此快的“进步”得益于黄永胜的推荐。然而，此时的江青也刻意拉拢温玉成，提出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工作，温玉成开始逐渐向江青一边倾斜。李必达写告密信，温玉成竟然没有制止，且提供了帮助。然而，李必达的卖主求荣没有成功，温玉成也卷入这场是非之中。连毛泽东都说温玉成是“靠打小报告起家的”。邱会作说：“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林彪给温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对他下毒手，把他保护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对杨成武那样把人整垮，关起来。林彪留下温玉成当一个‘活证据’，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可见，温玉成两头不讨好。事实证明，脚踏两条船的人很难在中央高层生存，对于江青极左派，或者与之对抗，或者同流合污。

（5）林彪对江青的态度。邱会作说“林彪反对江青的态度是一贯的，‘九大’后他曾向我们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1、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2、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3、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针对江青的活动，林彪曾对军委办事组诸人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她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

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邱会作还问林彪一句“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由此可见，林彪如果上台，一定会把江青为代表的势力清除出去，不许他们再兴风作浪。

（6）宪法修改草案的斗争。汪东兴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毛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只有林彪来当了。这是毛第一次对设国家主席一事的表态，也是毛首次提到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可以当。（这与毛后来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大相径庭）陈伯达坚拒担任宪法修改草案的负责人，最后起草修改宪法的权力落到康生和张春桥手中。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上是否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法宪与张春桥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康生让步，将此条写进宪法修改草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林彪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政治局讨论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当时讨论这一议题时没有太多争议，主要还是看毛泽东的态度。最后康生提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写好评备用，如果“上头”说不要，就不往宪法上面写，如果说要，即可加上，这样比较主动。康生在庐山会议前期都一直持有这个态度。关于张春桥对此问题的实际态度，邱会作说“张春桥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而是抱着‘上面定，他来办’的态度。记得有一次政治局讨论宪法稿时，张春桥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原则的分歧。主席只是不愿意和外国人多打交道，提出了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我建议，这个问题还是由主席自己去决定吧。政治局不要多提意见，以免干扰主席。’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时，张春桥的一点‘不同意见’，不过如此而已。”

为何后来毛泽东将设国家主席上纲上线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邱会作认为：“林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和即将通过的宪法中法定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比国家主席地位高多了。况且林彪历来重实际、轻虚名，他对国家主席是看得很轻的。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毛主席同样也对国家主席看得很轻。后来庐山上发生“倒张”，文化大革命的红人变成了过街老鼠，毛主席才把它当成是路线斗争。毛主席在庐山上对许世友说：“国家主席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可以当，让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当都可以，你许世友来当国家主席也是可以的嘛！”后来毛主席一改初衷，把“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得这么重，是什么反动的“政治纲领”，他是借此作为话柄打击林彪。”邱会作这一看法一语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

十五、庐山会议上的几个问题

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文革当中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以后的结果深深地影响了中共文革的进程，对中共政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官方史书认为林彪集团妄想夺取最高权力，与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迅速激化，酝酿着一场大的较量。”（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页208—209）然而，事实并非如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向毛泽东请示过，并得到毛的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由叶群陪同见了毛，提出讲话内容为关于宪法问题，讲一下对待毛泽东思想一些不正确的态度，没有成文的稿子，只是口头上向毛请示。毛一听林讲的事情就明白了，并让叶群守在门口，主要是防止江青突然闯进来。林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得到了毛的同意。邱会作说：“以我所知，林彪的讲话是毛主席要他讲的，至少是通过了毛主席同意。林彪是8月20日上山的，当天就去看了毛主席。第二天（21日）我们刚上山，叶群就对我们讲了他们看毛主席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林彪说：全会请主席讲话，要是主席这几天休息的好，就多讲上一

点。毛主席回答说：我（毛）不讲，你讲。那时林彪不会先于毛主席表态，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恪守的一个‘线’。没有毛主席那样说，林彪会去讲那个话？所谓‘林彪突然袭击抢着发言’一说，既不符合林彪内向沉稳的性格，也不符合林彪一贯遵守的准则。”（页436）这与陈伯达、吴法宪的回忆相一致。

（2）林彪的讲话对张春桥的打击。因为姓氏笔划相同，张春桥与邱会作坐在一起。邱注意到，林彪讲话谈及要警惕有人对待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态度时，张立刻紧张起来，脸色难看了，拿笔拼命记录，最后头上还冒出了不少汗。林讲完后，张拿出香烟，竟然点了三四次才点燃，显示出张春桥的失态，可见林彪讲话对张的打击之沉重。林彪并未点名，但张心里清楚，林彪讲话是在说他。事后叶群向邱透露说，“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页439）

（3）林彪讲话后的反响。反响之一是，上海帮灰头土脸。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得到毛的同意。而上海帮一伙人开始惶惶不安。开幕式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了后面，江青吊着阴沉的长脸生气，康生撅着小胡子一直不停地抽烟，张春桥低着头不敢看大家。一副灰溜溜的样子。（页441）康生在政治局会上甚至还批评张春桥说：“上海同军队的关系不好！”张春桥说：“这方面我们负主要责任，我准备作检讨。”（页449）反响之二是，多数中央委员，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们心情舒畅，许世友、杨得志甚至说“林总讲得太好了！这几年许多压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林总替我们说出来了，痛快！”“他们（上海帮）过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现在也轮到他们要倒霉了。”（页449）反响之三是，各组讨论时热烈拥护林彪的讲话，不仅军队干部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讲话，不少党内元老如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表态支持。陈毅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同他们斗争，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他们藏在犄角旮旯里，我陈毅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过去几年里，我是被他们打得躲在阴沟里不敢出来。现在我要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页453）反响之四是，全会气氛开始升温，声讨上海帮。会议讨论林彪讲话时，中央委员们已经清楚林彪讲话中批评的“坏人”就是张春桥，华北组里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更激发了人们的共鸣，党内元老们如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表态支持。党的元老虽然是以“普通”中央委员的身份分参加讨论，但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聂荣臻、李先念发言比较激烈，就是一向政治上非常稳重的陈云也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一定要参加。他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做的。（页452）官史说陈伯达等人“一时蒙蔽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云云（见席宣、金春明书，第211页），似乎“大多数中央委员们”都是些不谙时事的小孩子，一下子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蒙骗”。这种说法不过就是配合了毛泽东后来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的说辞而已，将大多数中央委员痛恨文革极左派在会上表露出的情绪和言行歪曲成“不明真相”从而“上当受骗”。这也未免太低估了这些经过党内斗争大风大浪锻炼的人吧。

为什么林彪的讲话激起了广大中央委员们的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邱会作说得好：“这个热闹的后面是什么？就是对中央文革那帮子人的不满。庐山的狂热是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嘛。对文化大革命那时还不敢说三道四，但对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某些事可以说说嘛，是不得人心呀！毛主席英明伟大，我们拥护，但你用的那几个人搞的那些事不行，违反了你的历来很多好的政策。所以林彪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这一句话就说明问题了嘛！热闹的真实意义就在这！不然它热闹干什么？！”（页454）

（4）军委办事组诸人事先并不知道林彪讲话打击张春桥。现今的党史教材都将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一事，说成是事先组织好的阴谋活动。但邱会作和李作鹏事先却完全不知道林彪要在此次会议上批评上海帮张春桥。李邱二人事后再三询问吴法宪，吴说“我事先不知道林总会在全会上批评他们。如果知道，以前不告诉你们，情有可原。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再不说，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页462）庐山会议开会时，身为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远在北京值班，也根本没有参与此事。所以，官史说林彪事先就曾秘密串联军委办事组诸位大将并有“约定”云云，乃子虚乌有。

（5）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角色。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表现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绝非是他自己在那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回忆里所说的那样。汪东兴的角色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汪东兴在上庐山伊始就交代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关于设国家主席，还是要提。”程世清转告吴法宪，吴再转告邱会作。邱认为这是汪再次向他们交了毛泽东的“底”；

第二，汪东兴在8月2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补充”毛在当天下午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谈话，汪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其实，这也是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言的由来）汪的“补充”引起康生的不满。（页434）康生、陈伯达这些政治局常委尚未发言传达，而汪东兴这个列席会议的记录者却越俎代庖，不仅逾越了他本人的身份，更有有意引导会议方向之虞。

第三，8月2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出各组应该讨论林的讲话，而汪东兴则提出重新播放林讲话的录音，理由是各组反映没有听清林的讲话（以往各党史教材均将此事安放在吴的头上）。

第四，汪东兴在24日迅速打印出陈伯达前一天晚上请人临时拼凑的马恩论天才的语录，并及时发给军委办事组诸人。汪还得意地说“要不然我这里怎么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第五，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调门”最高，其作用比陈伯达还大，因此与会者都认为汪带来了毛的声音。

第六，汪东兴鼓动大家及时发言表态。汪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这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页456）

第七，中央办公厅迅速地发出了《华北组简报》，直指“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在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大家）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开除党籍、应当批倒批臭。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第八，汪东兴可及时将毛泽东处的信息传达给军委办事组，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住处“闯宫”，就是汪及时通知军委办事组的。当庐山上的形势发生变化，林彪去毛处开常委会时，叶群还飞车追林，特别叮嘱林彪“如果出现了什么麻烦，要保护汪东兴。”（页458）由此可见，汪东兴在林彪阵营中的重要地位。

（6）江青向毛“告御状”引发毛采用极端的手段处理中央内部的矛盾。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邱会作认为，“林彪要讲的内容，毛主席事先知道。但他把上海帮的问题说到一定的程度，影射他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听者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毛主席可能没有料到。我以为，退一步讲，即使林彪把过头话说出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后来事态发展到上中央委员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触及到搞文化大革命的‘红人’的政治命运，毛主席就另当别论了。”（页436）事实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是了解的，对江青等人搞陈伯达、周恩来和林彪的“小动作”也曾有过批评，且允许林彪在中央全会上不点名地说一说。后来全会重听林讲话以及讨论林的讲话，毛都是同意的。但是会议激烈的程度超出了毛泽东允许的范围，毛泽东忽然发现上海帮在党内那么不得人心，且这股不满上海帮的高干背后还有林彪，这使得毛断然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压下这股风（笔者按，这就如同对待

“二月逆流”老师们如出一辙)。由此，毛开始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做文章，表示了激烈的反对态度。

十六、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斗争的几个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激烈的党内斗争，是文革开始以来党内的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显示了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病态式的坚持，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人们深入研究林彪事件以及文革日后的发展变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国内的党史教材对这一问题大都采取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缺乏像样的研究。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1) 毛泽东严辞批判陈伯达，指责陈伯达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毛将陈伯达找去谈话，严厉批陈，指责陈陷入了“军事俱乐部”。陈后来又去见了康生，康生则指责陈伯达“绑上了林副主席战车，我(康生)准备让你陈伯达杀我的头。”(页463)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就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也是用了“军事俱乐部”这一专有名词。如此，军委办事组前途堪虞。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放过在庐山上发起批张的林彪，而将斗争矛头指向陈伯达。

(2) 毛泽东拒绝吴法宪面谈的请求。军委办事组诸人认为吴法宪应该争取主动，主动求见毛“请罪”。但是毛却予以拒绝，回话说“1、思想上不要太紧张；2、要犯得起错误；3、我们都照‘孔夫子打牌’(和为贵)的方法办事。吴李邱三人研究后虽然觉得紧张空气有所减轻，但毛拒绝见吴仍非好兆。(页464)

(3) 毛泽东一手掌握了全会的进程，将林彪与陈伯达排除在外。周恩来、康生则每天去毛处开会。毛仅仅让林彪找军队中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而此时的汪东兴已经与军委办事组主任“划清界限”，不仅不再来往，向毛汇报林彪主持的这几次会议情况也颇多歪曲。毛对林彪更加不满。

(4) 毛泽东的又一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出台。毛泽东经过几天的思考，发出了声讨陈伯达的战斗令。首先，毛翻脸不认人，将陈伯达一棍子打死，毛用了极为刻薄的字眼，完全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陈伯达；其次，毛将林彪与陈伯达区隔开来，声称“我与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一致认为……”云云；再次，毛将打击上海帮的人定性为“受骗上当”，对军委办事组提出了“警告”。

(5) 毛泽东要求黄永胜“反戈一击”。毛将在京的黄永胜召上山谈话，批黄说“对人家搞突然袭击，张春桥手无寸铁的搞他干什么，还那样厉害！”毛还说，“你们一方面军的干部骄傲自大，没有四方面军的干部谨慎。”(页477) 毛泽东此时的真意是要黄“揭盖子”，揭发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反江青、张春桥的内情。但是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黄克诚，没有听从毛的暗示，只是表态说对张春桥等人有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斗争的态度：

(1) 林彪出面保护吴法宪。有人在会上揭发吴法宪说假话，攻击诬陷张春桥。这里不仅牵涉到政治局里的一些要人，更牵涉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林彪此时出面保吴。林说：“吴法宪跟了我几十年，我没有听他说假话，也没有听过别人说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在宪法小组里，大家运用毛泽东思想修改编写宪法，有过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说，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那样就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了。”

（2）林彪对毛处理庐山会议斗争采取“三不主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做什么解释、不干扰毛对问题的处理。在这一期间，林彪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不找人谈话。庐山会议期间林彪没有任何单独活动。林彪后来向军委办事组解释说“一个人捣鬼还是没有捣鬼，自己说了不能算数，要别人说了才能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把柄。”（页461）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

（1）周恩来在政治问题上十分谨慎，不轻易表态。当会议升温批张春桥时，周恩来却叮嘱邱会作说：“不要心血来潮就不顾后果，要考虑成熟，看一看时机再说。”周还说：“现在事情刚刚开始，要注意保持联系。”（页449）毛泽东没有发话批判张春桥时，周恩来绝对不会主动上阵批张。

（2）当毛泽东责令停止会议讨论林彪讲话，情势发声变化时，周及时叮嘱军委办事组，让邱会作找去说：“会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们不利，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陈伯达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对你来说，不管事情如何复杂，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是吴法宪现在成了局中人，他脑子现在比较乱，要想的事也多，你和李作鹏要很好地帮助他。除此之外，你要把你们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以便我有所帮助。”（页464）

（3）周恩来努力设法平息风波。据邱会作的回忆，当时周恩来处理庐山会议事务贯彻了三条宗旨：1、完整地传达毛的指示；2、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3、对各方面反映上来的意见，谨慎小心有选择地上报给毛泽东。从而做到息事宁人，使会议能继续进行，完成预定的任务，不再发生其他意外。（页466）几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例一，吴李邱三人因心情郁闷出门观赏庐山风景，路过陈伯达门口，被中央警卫团汇报到周处，指责他们暗中串联。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情况后批评中央警卫团汇报不实。例二，周恩来帮助吴法宪过关，配合林彪平息了所谓的“吴法宪假话风波”。例三，几个大军区司令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写信给毛林，批判张春桥，措词严厉，许世友甚至提出应该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农村改造”云云。周恩来鉴于庐山形势已发生变化，遂将信压了下来，转给了林彪。并留条说“请林副主席阅，并存叶群处”。一来可以减少对毛的干扰，二来防止被康生、江青等人利用生事，三来也保护了军队的将领。此外，周还保护陈毅，不同意康生批陈毅的看法。周还帮助吴法宪写检查，并在毛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为吴法宪解脱。毛则删去了《我的一点意见》中涉及吴法宪的字眼。周恩来还要求李邱二人帮助吴法宪过关，以求避免因为吴倒台而牵扯到林彪的情事发生。（页468——472、页479）

（4）周向邱等人透露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问题的想法。周私下向邱会作转达了毛的一些说法，周恩来说，“主席提到，庐山上发生的问题本来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林副主席和陈伯达身上发生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周恩来又讲，“主席说他们（上海帮）并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说的，但是对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不许可，此例如果成立，今后就会接二连三地发展下去。”（页483—484）但是毛泽东也许忘记了江青当年就是采取同样的方式一举打倒了陶铸，并得到毛事后的默许。

为何毛泽东此时采取了保张、倒陈、饶吴、拉林的方式暂时结束庐山上的斗争？邱会作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没有经过毛主席点头的情况下，中央里就发生了打倒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事，那今后他的绝对权威就会荡然无存。毛主席对于向他权威挑战的人，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他都迎头痛击，绝不手软。当然，毛主席对‘林彪问题’还有更深的考虑。毛主席把林彪立为

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他身后，让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然而，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中，毛主席看出了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而是上海帮。到了庐山会议，毛主席发现林彪不但不是他的思想继承者，也难说是组织上的继承者，而且对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上海帮都不能容了。现在他还活着，林彪就对上海帮这样，今后林彪接班了，那些人肯定没有好结果，那么文化大革命也得被否了，或是名存实亡了。那样一来，毛主席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初衷就落空了。毛主席抓住陈伯达的小辫子一棍子打死，外人很难理解。其实，他这是在警示林彪。”（页486）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十七、林彪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出手打击“上海帮”？

这个问题以往很少被人论述到。林彪以往在政治上还是极为沉稳的，轻易不会出面表态。从文革过往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林彪是采取“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态度，一切都要等毛泽东表态后再表示拥护，以免日后被人抓把柄。但是这次为何林彪带头上阵批评张春桥这位毛泽东的文革“红人”？这实在有违林彪一贯秉持的处事原则。笔者曾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一文中对此略作分析：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林彪这一举动并未在事前与周恩来或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作过商讨，很可能仅仅与陈伯达等极个别人交换过意见。陈伯达在林彪刚上庐山伊始就拜访了林，长谈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很可能对林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林彪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叶群的影响。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指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读罢邱会作的回忆，笔者终于对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

邱会作回忆说：“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出题目”是把上海帮的问题正式提到毛主席那里去，看毛主席怎么办。“指出来”是在一定场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帮的问题，“敲边鼓”是旁敲侧击他们，给以警示！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在林彪犹豫之际，陈伯达提出最好是“指出来”。起初，林彪对批张还有犹豫，陈伯达还为林彪作了分析：“其一、毛主席和林彪是亲密战友，历来互相支持，毛主席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讨厌的人，毛主席就搬开。其二、毛主席知道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和反林彪、周恩来的事，批评了上海帮，表示以后要拆散他们。其三、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人讨厌上海帮，受过他们的伤害，只要林彪‘点’一下，就会受到广泛的拥护。”（页440）

正是由于陈伯达的鼓动，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第一线。

再下一个问题是，为何林彪选择张春桥作为批评的对象？

邱会作认为：“上海帮在中央里有四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资格很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深受毛主席信任，又与周恩来的关系不一般，不能去打；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不便去打；姚文元是书呆子，不值得去打。而张春桥是上海帮主要做工作的人，也是康、江、张、姚之间以及各路造反派头面人物互相联系的关键一环。打垮了张春桥，就等于打散了上海帮。”（页442）

林彪能够听进陈伯达的意见，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1、陈伯达作为笔杆子长期跟随毛泽东，是中共最主要的理论权威之一。林彪的部下都是军人出身，缺少思想理论工作的人才。陈伯达在林彪阵营中能够发挥其理论家的作用。2、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虽然贵为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并无实权，长期被江青等人欺压，而陈伯达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军委八项命

令》一定程度上遏止造反派，以及“九大”后停止中央文革的活动等，都与林彪相配合。陈伯达由此得到林彪的信任。3、陈伯达与林彪在政治理念上相近，如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林彪就主张要发展生产，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搞运动。也就是说，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要适当地给文革运动降温，使国家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林彪的失误何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起对张春桥的批评，得到了众多中央委员们的支持，林彪几近成功。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激烈态度，庐山会议倒张一役功亏一篑，这也成为林彪日后倒台的根本原因。那么林彪在庐山上有何失误呢？邱会作认为“我们对上海帮的力量，特别是对江青的作用估计不足。只看到毛主席厌烦江青、政治上批评她、感情生活上冷淡她的一面，没有看到毛主席还要利用她，要对她负责任的一面。‘九大’以后，江青攻击周恩来，被抓住了辫子，毛主席批评了她几句，我们利令智昏，以为毛主席在生活上甩开江青以后，进而在政治上也要抛开她了。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是把江青他们当成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看待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份量太重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得多。我们去打上海帮，触及了文化大革命，触怒了毛主席，惹了大祸。在以后的岁月里，1972年邓小平复出了，我看他对江青他们，也犯有和我们类似的错误，对那伙人的力量估计不足。邓小平以为毛主席让他主持中央工作了，把江青他们说成是‘四人帮’批评了。邓小平以为自己可以放手大干，尽可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工作抓起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导致了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台。”邱会作进一步指出：“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将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负责任的政治家，迟早都要搞掉上海帮。六年之后华国锋、叶剑英不是那样做了。林彪只是选择的时机不对。”“如果说林彪有误判的话，不是他对整一下张春桥的决心下错了，他的误判在于不知道中央委员会里有那么多人厌恶上海帮，由此把解决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演化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文革派’的问题，进而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了，从而引发了毛主席的过激反应，这和当初‘二月逆流’引发毛主席震怒类似。”（页490—491）这一看法确是真知灼见。

十八、如何看待陈伯达的倒台？

陈伯达是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蒙难者，也是毛泽东继文革开始以来打倒刘邓陶之后亲自出手打倒的又一个政治局常委。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完全回避了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性质，似乎陈伯达的被打倒是毛泽东解决“林彪反党集团”的前奏曲，是一个英明、正确的决定，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一斗争的实质，掩盖了毛泽东大搞政治迫害、制造冤案的本来面目。邱会作的回忆在这方面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邱会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五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两名，二十几名政治局委员中十几名上阵打张春桥，那么多党的元老表示了鲜明态度。毛主席对此不能不了了之。毛主席不能让张春桥被打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代表，否定了他们，就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不是把张春桥当作一个人的问题来考虑，而是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看待。毛主席知道他在群众中不得人心，在老干部中更是名声臭。如果毛主席稍微松口，张春桥就垮台了，继而来之的‘批张’势必引起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议论，引发出更多的复杂问题而难于控制，毛主席决不会那么做。毛主席对林彪也不能马上整，甚至公开批评也不便。林彪在历史上有重大功绩，是有‘山头’的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部分的精锐，是以林彪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的。批判林彪，会涉及一大批人，使军队思想混乱，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会有困难。近年来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接班人，突然把他打倒，不要说是普通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想不通。说到底，毛主席不是念林彪的赫赫战功，不是念他们多年合作的情感，也不是怜悯这个军事天才免遭凄凉下场才不去打倒，毛主席完全是在考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事业，才下了暂不动林彪的决心。毛主席不能同意打倒张春桥，也不能直接批评林彪，牺牲陈伯达便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好像《三国演义》里曹操在官渡之战那样，借了粮秣官的人头以服部众。”

邱会作的这段分析道出了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本意和真实目的。毛泽东知道，林彪和陈伯达没有历史上的渊源，军委办事组与陈伯达关系密切皆源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的关系。毛把陈伯达打倒了，暂时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且陈伯达乃一文人而已，并无深厚的组织基础。打倒了陈伯达，对林彪是个警告，毛泽东再找他人作笔杆子也并非难事。所以牺牲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最佳选择。陈伯达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发表一些看法完全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章程，其激烈的程度远远低于汪东兴的发言。退一万步说，即使陈的发言有某些不当之处，也属于正常。毛泽东不是常常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毛还说过，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为何陈伯达在会议上发表一些言论就因言治罪？难道陈伯达同意“设国家主席”和支持了“天才论”就应该被彻底打倒吗？为何毛泽东不经过任何正常的程序和手续，不经中央委员会讨论，以明定陈伯达之罪呢？为何仅仅凭着毛泽东一句话就将陈伯达置于死地？事实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打倒陈伯达乃是出于其政治目的。换句话说，陈伯达的倒台实乃毛泽东亲手制造的又一起冤案！

十九、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几个问题

(1) 毛泽东在庐山上和庐山下态度不一，出尔反尔。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下山前传达了毛的指示“事情到此为止，只在山上，不许带到山下。回去以后，政治局开一个民主生活会，作些自我批评，抓好团结。”“这次比上次庐山会议（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八届八中全会）处理得好，应当让犯错误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全党要搞好读书学习，首先政治局要好好读书学习，开好民主生活会。政治局要领导好全党的批修整风，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当前最主要的。”毛还否定了康生提出的“要把问题落实到‘人头’上，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的建议。(页 4 8 9) 似乎毛已经将军委办事组与陈伯达区隔开来。但是下山后，毛依然抓住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不放，并进一步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牵连进去。这意味着毛推翻了他自己在庐山上讲的“事情在山上解决了，不带下山”的说辞。黄李邱等人也不得不写深刻检讨，以求过关。对于毛泽东的出尔反尔，邱会作说“毛主席曾说‘问题不带下山’，不久又把老账翻出来；有时公开说庐山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又揪住我们不放；有时好言安抚我们，可转眼间又严加指责；他一会这样，马上又那样……搞得我们摸不着头脑，懵头转向。多少年来，我没见过毛主席这样出尔反尔地处理重大问题。在华北会议上，无辜的李雪峰、郑维山垮了台，黄永胜又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些使我的心情非常压抑，思想包袱更加沉重了。”(页 5 1 0)

(2) 军委办事组试图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由于“上海帮”有意抵制政治局生活会，使庐山上产生的矛盾无法弥合。军委办事组认识到不能指望政治局召开生活会以解决争端和矛盾，必须争取主动，批判陈伯达，批判“天才论”。军委办事组于是在全军开展批判“天才论”的学习运动，造了不少声势。这也是军委办事组试图划清与陈伯达的关系的重要措施。外人对此搞不懂，以为军队“不务正业”，但军委办事组心里清楚，这是必须搞的，是作给毛泽东看的。(页 4 9 4、5 0 1)

(3) 军委办事组也影响林彪采取主动。军委办事组向叶群建议，加强与毛沟通，林应主动向毛作个自我批评，以迎合一下毛。1970年9月28日林从北戴河返京去见毛，主动“认错”说：“我还没有回家就先来看主席。庐山会议过了快一个月了，当时我缺乏应有的谨慎，讲了些欠妥的话，结果在房间里划了根火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主席很关心，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毛说：“擦根火柴是烧不着房子的，因为目的不在于烧房子。我每个月都要擦几盒火柴，除了抽烟，什么也没烧过。对问题反复思考是对的，但也不要搞得不敢说话了。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多数人是不会说话的，这些年好些了，我们要注意发扬敢说话的好作风。”毛对林彪的“认错”是高兴的。此外，林彪注意多向毛送部队和战备方面的有关资料。毛还找叶群谈话，大意

是：最近林彪同志想的问题很多，送来的材料都看过了。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问题见解是独到的。告诉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陈伯达的问题（从此不说是庐山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也不难处理，这件事情由我来办。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战备。（页 502—503）

（4）毛泽东利用 38 军揭发陈伯达的资料作为“石头”打击军委办事组。表面上，该揭发材料是针对陈伯达的，但是却成了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撤换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38 军在文革初期支持河北省的造反派，与河北省委和军委办事组搞对立，但却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中央军委一直对 38 军有所批评，而这次 38 军揭发陈伯达实际上是向军委办事组报了一箭之仇。毛要求召开“华北会议”，并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会，参加批判，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许多无端的指责、揭发和批判。而毛则顺势拿下李雪峰和郑维山，由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取而代之。

（5）1971 年春节后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诸人的谈话。第一，对张春桥的问题，没有毛事先的同意，无论如何不可去做。第二，江青的问题特殊，必须忍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第三，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要写出有份量的检讨。周甚至将自己延安整风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要彻底讲清自己的错误和问题。黄永胜代表军委办事组表示，大家心里有怨气，那几个人太霸道，很难共事，另外，担心毛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周当场表示，不存在信任问题，否则毛早就采取断然措施了。周最后说“我和办事组的同志们是心心相印的。你们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我感激诸位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页 519—520）换句话说，军委办事组乃至林彪都必须放下自尊，自毁认错，彻底屈从于毛泽东，才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宽大处理，周恩来自己就是明显一例。

（6）毛泽东在军委座谈会前后的出尔反尔。军委办事组内部在是否应该在会上作检讨有过不同意见。黄永胜通过汪东兴请示了毛，毛表态“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作检讨了。”毛在会议期间还说“军委的会，整风还可以，但批陈不够。”军委办事组于是加强对陈伯达的批判。然而，毛的一个批示重重地打了军委办事组一闷棍：“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江青、张春桥趁机狠批军委办事组，连江青的“文艺战士”于会泳、刘庆棠、钱浩亮也竟然列席会议并发言，毛远新更是言词激烈，恶狠狠地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对陈伯达仅仅批判还不够，还必须进行审讯！和陈伯达一起发难的人，现在一不揭发他，二不批判他，是愚蠢的。毛主席对庐山上犯错误的人不断批评教育，并且很宽大，但要是超过了限度，全党不会答应！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把刘邓反动司令部摧毁了。如果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坚决地摧毁。”（页 524）人们一直以为毛远新在 1975 年批邓事件上起了重要作用，殊不知早在 1971 年初打击军委办事组问题上，毛远新就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做深刻检讨。黄永胜带头做检讨，军委办事组内部也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在检讨报告上批示曰“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7）毛泽东对林彪的“妥协”。毛在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召集军委办事组谈话，并提议周恩来带队去北戴河向林彪作汇报，主要向林介绍中央出现的问题、陈伯达审查情况和国际形势即外交工作等。毛的这个态度值得人们深思。邱会作认为：“庐山会议后，毛主席用了很多手段调整中央里两派的力量，支持原中央文革那一方，对我们施行高压政策。可林彪就是不吭气，任听毛主席摆布。到了此时，毛主席再压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了，于是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让步’，想结束庐山问题，至少先挂起来，这才让我们到北戴河去。毛主席的这个举止，我看可以表示两层意思。一是他和林彪在如何对待上海帮而产生了隔阂，他想修复，促进全党的团结；二是他表示了对林彪一定的尊重，不会把林彪晾在一边。”（页 541）

（8）毛泽东第二次与军委办事组谈话，表示处理完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问题。如今的文革史当中流传着李德生的一个回忆，说毛泽东对刚从北戴河林彪处返京的黄永胜等人大为不满。李德生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说什么。”（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第5页）

然而邱会作的回忆却印证了一个与李德生回忆截然相反的事实。当毛泽东听周恩来介绍军委办事组在北戴河受到林彪“批评”时，高兴地说“不要怕批评，你们心里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毛还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所以有个正确使用的问题。”周恩来此时插话说，“王明路线打着批评的旗号，伤害了很多的好同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受害者。”（页542）随后毛兴致勃勃地大谈了一番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笔者认为，毛后来的南巡讲话也是这套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发展），批陈整风和陈伯达的问题。毛向黄永胜表示“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然后又向周恩来说：“他们几个的事，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毛还对周恩来说，“他们几个的事，在我这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最后，毛又对黄吴李邱几人重复地说了一遍：“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都处理完了。”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规模，周恩来提议到会者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中央党政军机关中的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元帅、大将和一些老同志。人数不超过一百人。毛对此也点头同意。（页543—544）

吴法宪的回忆对此也有相应的描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引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第839页）从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来看，虽然在回忆毛泽东谈话方面有些出入，但总的意思不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并未说过那番语气激烈的话。如果确有李德生回忆中毛的那番话语，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不会忘得干干净净，更何况这是关系到他们自身的政治生命和安危，毛泽东就此问题的处理态度也是日后中央政治工作走向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李德生的所谓回忆并不可靠。

（9）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斗争。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要把这个会开成“过关会”，因此利用毛的谈话指示精神为“挡箭牌”。而上海帮则希望将会议开成批斗会，逼军委办事组作检讨，并声称“要抓路线斗争的新方向”。在西南组开会时，徐景贤、毛远新等人就集中围攻吴法宪，导致吴心脏病发。（页546、552）周恩来随后到西南组坐镇，制止对吴法宪的继续揪斗。林彪得知消息后当天即从北戴河返京，叶群从机场直接到会场，声明是毛让林回京加强对会议的领导云云，压制了上海帮揪人斗人的企图。但是在会议结束时仍然按毛的旨意给军委办事组作了“组织结论”——“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对于是否向下传达会议精神，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决定只限于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种党委常委，各兵种指挥达到司令、政委。

在文革当中与江青等极左派的斗争，惟有军委办事组是被中共中央认定犯了“路线错误和宗派错误”。其实这就是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的明证。邱会作说：“中央给我们几个人作了书面组织结论，是对我们的沉重政治打击，是上海帮的很大胜利。但是，它又为我们反对‘四人帮’留下了铁证，是我们的光荣！其实那时我心中就没有‘不光彩’的感觉。我们反对康生、江青

一伙的斗争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稳定，也就没有国家的稳定。解放军不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进入各级领导机构，他们就会夺取更大的权力。并不是我们个人有多么高明，去反对他们那伙人，当时任何一个处在军队领导岗位上有良知的人都会那么做，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页 5 5 7）

（10）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态度。自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希望林彪公开出来认个错，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可是林彪就是不愿开这个口。一次叶群在与黄吴李邱等人议论时，将林的想法说了出来。叶群说：“林总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心里清楚，不就是反了一下上海帮吗？如果林总给了你们批评，就是给了别人子弹，会用它来打你们。”（页 5 7 3）以笔者之见，叶群这番话其实也完全适用于林彪自身，如果林彪出面作了“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毛泽东和江青等人提供了子弹，反过来用来打击林彪，就如同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的信一般，被毛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成为打倒彭的一个武器。

（11）毛泽东找叶群谈话，释出对林彪的善意。1971年“五一”天安门观礼后，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内很亲热地与叶群作了长谈。叶群事后回忆，毛谈话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犯错误的两重性，不管大错小错，改了就好；二是注意学习党内斗争的历史，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三是不要忘乎所以和盲目性，要学会冷静思考问题。整体来说，毛对叶群是安抚的，所以，叶群那天非常高兴，并随后转告军委办事组其他人。（页 5 6 5）这一情节也可通过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予以印证，张云生回忆说：“国庆节后那几天，叶群的情绪尤其‘高涨’，原因是在参加国庆大典时，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她回到毛家湾后得意地说：‘主席对我很关心，还鼓励我多看马列，多……’”（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年7月版 第622页）毛泽东对叶群释出某种善意，也可以说是对林彪释出的某种善意。

笔者认为，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到1971年4月底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整整8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态度是采取了出尔反尔、又打又拉的手段，一方面在庐山上表示，庐山上犯错误的人是属受骗上当，问题在山上解决，不带下山，而另一方面却在下山后抓住军委办事组的检讨不放，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一方面表示军委办事组不必在会议上作检讨了，而另一方面却指责军委办事组不批陈，压迫几位大将们作检查。一方面在接见军委办事组之时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另一方面却纵容江青等人在会议上继续围攻批判军委办事组诸人，并给几位大将们作政治结论。毛泽东的这些手段交替使用，的确将军委办事组搞得七上八下，不知所措。但是毛泽东背后的最终目的还是针对林彪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起因于林彪的讲话批评了张春桥，从而引发了大多数中央委员们的共鸣，毛泽东以牺牲陈伯达而保护了张春桥，再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林彪低头。但是林彪却软硬不吃，毛泽东犹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自下台阶，以给军委办事组做所谓政治结论为结果，暂时将这场“斗争”划上了句号。

二十、1971年一个相安无事的夏天

文革史与林彪事件的确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笔者注意到一些写科幻小说的人，甚至搞经济学研究的人，也写了大部头的文革史“著作”（如柯云路《极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分析》明镜出版社2007年3月版、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然翻看之余未免觉得遗憾。这些人太热衷于表面的现象和道听途说，没有下真实的功夫，大多人云亦云。以“913事件”为例，他们的题目常常耸人听闻：“毛泽东与林彪殊死斗争”，“毛林摊牌恶斗”、“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等等，一派“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你来我往的热闹景象，似乎毛林双方此时此刻都已剑拔弩张，要打个你死我活。不知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么耸人听闻的结论。那简直犹如

京夫子、师东兵、辛子陵的演义小说再版。每当笔者看到如此之内容，总是不免哑然失笑。这些人实在夸大了这场斗争的规模，似乎非如此不能体现毛林双方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揭示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1）为了平息中央内部产生的争端，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自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上海帮里的张春桥回上海主持工作，有事才来北京。而江青也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借口养病，到海南岛、青岛等处游山玩水。周恩来特别交代军委办事组负责安排好江青在外地的活动。中央内部两个经常生事的主角不在了，再加上康生称病不出门，中央内部自然也就安静下来。军委办事组诸人在前一段时期被毛泽东整怕了，更不愿多生是非，于是中央上层出现了少见的一片“和谐”气象。（页 5 6 3）

（2）中央政治局从较多地谈论政治转到研究业务工作，落实九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战备工作。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见面也客客气气，双方都不愿打破这种政治平衡。而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汇报。毛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8月中旬以前毛没有发过什么重要指示。（页 5 6 2—5 6 3、5 6 7）

（3）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事务上，专心思考“美国问题”，研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开展了“联美制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7月初秘密来华访问。美中双方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适当时机访华。毛此时心情较好，重读了《红楼梦》，周恩来还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毛对“红学”的研究。（页 5 6 2—5 6 3）

（4）毛对军委办事组的战备工作并未放松，7月底还找过黄永胜去毛处汇报战备工作。（页 5 6 9）

（5）林彪在这段时间更加沉默，对他主管的军队工作没有发表过任何指示。6月份即在北戴河休息，除了例行的文件传递外，林彪与北京没有什么主动联系。军委办事组诸人也从未听过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页 5 6 3、5 6 6）

（6）叶群回京治病。7月下旬叶群发现乳房长了异物，在医生的建议下于8月3日从北戴河回北京进一步检查。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后排除了癌症的可能，周恩来特别对吴法宪交代让叶群在京好好休息，不必参加政治局会议。叶群检查之后给毛泽东的秘书打了电话，想去见毛，但等了两天，毛处毫无动静。显然，毛回拒了叶群的请求。（页 5 8 2—5 8 3）

（7）叶群开始为自己的子女解决婚姻大事。毛泽东曾经关心过此事，发话说“豆豆和老虎都不小了，应当解决婚事。”毛还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外面的老百姓接触不到，要托人帮帮忙，找一找，办一下才行，否则就把孩子耽误了。”有了毛的话，叶群开始到处张罗，几位军队领导的夫人也都出来帮忙。（页 5 6 7）

从邱会作的这段回忆来看，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都非常谨慎小心，双方亦很克制，不愿惹出新的麻烦，中央的工作也从政治问题转到业务问题上来。这个相安无事的夏天是毛泽东压制军委办事组，扶植上海帮的必然结果。然而，矛盾斗争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并不等于说矛盾消失了。其中的“暗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并不满意，毕竟林彪没有象毛所希望的那样出面做自我批评。毛在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曾说起“自己做了事，采取‘闭口道士’的办法是不行的。自己不讲别人还是会讲的。”叶剑英认为这是针对林彪的，并将毛的话转给了叶群和黄永胜。这虽然引起叶群的注意，但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页 5 7 3）总的说来，1971年的夏天中央相当平静，毛泽东住在北京，而林彪则住在北戴河，大家相安无事，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没有出现任何激烈的斗争。然而，庐山会议问题虽然看似解决了，

但毛可以随时拿起来变成一根打人的棍子。这个时期的林彪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彻底沉默，而毛泽东方面则保持冷静，但主动权在握。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